

专 题

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及其对地区战略环境的影响

〔日〕加藤洋一

内容提要：奥巴马政府“再平衡”战略理念的核心是将战略重心由中东转移到亚太。在军事层面上，美国需要重塑其在亚太军事投送能力的可信度。“再平衡”战略的经济核心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尽管很多亚太国家对于“再平衡”战略表示欢迎，但也忧虑其可行性以及财政因素对其造成的制约。“再平衡”战略使美国的亚太盟友获得了美国在安全上的再保证。然而，由于美国在亚太的地位变化，“再平衡”战略也加剧了亚太国家的两难选择困境。中美两国的亚太战略理念是否能够兼容，将对亚太的未来发挥关键影响。

关键词：奥巴马政府 再平衡战略 亚太安全 新型大国关系

自美国奥巴马政府启动“重返亚太”或“亚太再平衡”战略（“pivot” or “rebalance” to the Asia-Pacific region），已经超过一年半的时间。这一战略现已进入实施阶段，并且美国采取了很多实际行动，包括在澳大利亚北部轮值驻守美国海军陆战部队以及在新加坡部署濒海战斗舰。正在进行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代表着这一新战略的经济维度。但是，新战略给区域安全环境带来的变化并不限于美国政府所推行和领导的这些新措施。美国的再平衡战略正使得这一地区，尤其是中美之间的权力结构和力量平衡，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并且可能进一步加剧区域内国家的困境，让这一地区的战略环境变得更为错综复杂。

〔日〕加藤洋一 《朝日新闻》编辑委员、国家安全事务记者。

一、美国战略再平衡的现状

美国对亚太地区战略再平衡的缘起要追溯到奥巴马总统就职之前。据他身边的幕僚，包括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汤姆·多尼隆（Tom Donilon）所称，奥巴马在2009年1月正式就任总统之前，就指派他的国家安全团队着手对美国的全球力量部署和优先顺序进行战略再评估。基于这一研究，奥巴马自己的判断是美国过于侧重中东而相对轻视了亚太。再平衡战略旨在纠正这种美国责任在地理上的不平衡性。

整体对外政策的转变在奥巴马政权伊始就初露端倪：新任命的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将亚洲作为首访之地，并且首位受邀访问白宫的外国领导人便是日本首相。很明显，亚太地区被当作了主要焦点。但是，直到两年之后新战略才清楚成形，并付诸实施。这是因为奥巴马政府的精力在此时期完全被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所占据。它们没有任何的政治资本和资源来纠正这一“地缘不平衡性”。

“重返”（pivot）这一术语最初出现在2011年10月美国《外交政策》杂志（*Foreign Policy*）刊载的一篇希拉里·克林顿撰写的政论文《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中。她列出了美国的三个目标：“坚持领导、维护利益、提升价值”，并阐释了区域战略的六条行动纲领：

1. 强化双边安全同盟；
2. 深化与中国等崛起国家的关系；
3. 参与区域多边机制；
4. 扩大贸易与投资；
5. 建立广泛的军事存在；
6. 促进民主与人权。

奥巴马总统将再平衡的终极目标总结为三点：安全、繁荣、所有人的尊严。这一解释来自他于2011年11月在澳大利亚国会所发表的演讲，也就在克林顿文章发表之后几周时间内。2013年3月，多尼隆在位于纽约的亚洲协会（the Asia Society）发言，也重申了奥巴马演讲的核心内容。他说道：“美国在这一地区至高无上的目标是维持一个稳定的安全环境、根植于经济开放的区域秩序、和平解决争端、对普世权利与自由的尊重。”多尼隆进一步阐释美国战略的五大支柱：

1. 强化同盟关系；
2. 深化与崛起国家的伙伴关系；
3. 与中国建立一个稳定、富有成效、建设性的关系；
4. 推进区域机制；
5. 帮助建立能维持共同繁荣的区域经济架构。

他总结道,“再平衡战略意味着投入必要的时间、努力和资源来实现如上每一个目标。”

将这五个“支柱”与克林顿的“六条行动纲领”相比较,可以发现一些变化,如增加了专门针对中国的说明,不再提及“民主与人权”。这些变化意味着在奥巴马政府内部仍然存在着关于再平衡战略具体内容的政策辩论。

另一个微小的例子则明确反映出了政府内部的困惑,即有关使用“重返”还是“再平衡”来解释新战略。“重返”是最初的选择,最早出现在2011年秋天克林顿发表在《外交政策》杂志的文章中。数月之后,“重返”的说法被“再平衡”所取代。缘由是美国的欧洲盟友发出了抗议之声,认为“重返”一词的效果听起来就像美国将彻底对欧洲和中东背过身去,并将这些地区抛弃。共和党也提出了相似的批评。但是,在2012年秋天奥巴马总统本人再次使用了“转向”,并且在其选战期间的总统候选人辩论中让此词复活。不论具体原因如何,这一系列的变化至少表明连如何表述这一新战略的共识都不存在。

然而,其核心理念从一开始就是坚定明确的。那便是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历经了十年之久的反恐战争后,将把战略重心从中东转移到亚太。奥巴马总统解释道,“在耗时十年的两场战争后,美国正把注意力转到亚太地区的巨大潜能上。”他还宣称,“美国是太平洋国家,我们就待在这里。”这一转移不仅是地缘性的,也是目标性的。换言之,这也意味着战略重心从应对全球性伊斯兰军事组织——基地组织造成的恐怖主义转向应对崛起的中国带来的挑战。

可以认为美国终于在战略注意力被分散达十年之久后,回到了对美国利益的根本战略挑战上。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造成了三千多无辜美国公民的丧生,并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威胁形式。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人间悲剧和美国国家安全的历史性灾难。但是,基地组织的最低目标是使美国不再干涉中东事务,尤其是以色列问题。另一方面,来自中国的挑战在性质上更具本质性,因为它从根本上关系到维护美国在亚太和其他地区的优势地位,也就是涉及区域和全球权力结构的未来。

紧随“9·11”恐怖袭击,美国将战略重心从中国的挑战迅速转移到源自伊斯兰武装团体的新威胁。近年来,焦点逐渐回到中国身上。奥巴马政府再平衡战略的提出可被视为美国战略重心逐步移回中国达到高潮的体现。美国终于为其战略思维和计划中“失落的十年”画上句点。

然而,美国在此期间的真正损失不容小觑。美国失去了其军事实力的无上地位——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区域国家都无可与之匹敌。即使这不是美国军事实力的真实变化,也至少是区域国家的感受。美国在此区域的主导地位主要依靠其力量投射能力的可信度,航母战斗群的广泛行动是最佳佐证。最显著的例子之一是

来自中国的挑战在性质上更具本质性,因为它从根本上关系到维护美国在亚太和其他地区的优势地位。

1996年所谓“台海危机”发生时，美国向台湾附近海域派遣了两个航母战斗群。美国力量投射能力的可信度正在受到地区国家的质疑，虽然它们没有完全失去信心。这是由于中国的军事实力在过去十年中取得显著的提升和进步，而美国却被其他事务所扰。奥巴马总统在澳大利亚的演讲中表明，“我们会保持自身力量投射和威慑的独特能力。”

美国密切关注着中国所发展的一系列的军事能力，这些军事能力可能削弱美国的力量投射能力，其中一个武器系统是反舰弹道导弹（ASBM）DF-21D。美国认为这一弹道导弹的研发针对的是美国航母。2010年12月，时任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的罗伯特·威拉德上将（Admiral Robert Willard）在接受笔者采访时称，中国的反舰弹道导弹已经到达了与西方同等的“初始作战能力”（IOC），即意味着导弹能够被部署，即使其还面临若干年的测试。这也证明了美国是如此密切地追踪着中国武器系统的发展情况。美国将中国的这一军事能力称为“反介入/区域拒止”（anti-access/area denial，简称A2/AD）能力，并将之视作实施再平衡战略时美军所面临的最严重挑战之一。

近期，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了2013年《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报告于2013年5月发布，称DF-21D导弹已处于部署状态。在报告发布会上，副部长助理戴维·赫尔维（David Helvey）对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作出如下说明：“中国正对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进行全面投入，因此，我们看到其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提升，我们将来也会看到其继续发展。”很明显，美国一直怀着很大兴趣密切关注着这一武器系统的进展。

在再平衡战略的军事层面上，美国试图重塑其一度受损的军事投射能力的可信度。除了将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之外，美国再平衡战略的另一主要支柱是保持其区域“领导力”，即维护美国的区域优势地位。据多尼隆所称，这一想法源自奥巴马总统本人。多尼隆解释道，“在被‘9·11’袭击、两场战争、金融危机所标记的十年过去后，奥巴马出任总统时就决心要重建美国全球领导力的基础。”

要实现这一目标并完成再平衡，美国必须恢复力量投射能力的可信度。2012年1月，奥巴马总统和时任国防部长的帕内塔（Leon Panetta）共同发布了阐释再平衡军事层面的战略文件，上述观点清楚地反映在文件标题中——《保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力：21世纪国防的首要任务》（*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文件将“在反介入/区域拒止挑战下的力量投射”列为美军的首要任务之一，并且点名中国和伊朗为“将继续寻求非对称手段对抗我们的力量投射能力”的国家。

旨在应对反介入/区域拒止挑战的一个新作战概念是“空海一体战”——由美国空军和海军联合行动以实现能力的最大化，应对反介入/区域拒止环境下的挑战。有关空海一体战的细节还没有被揭示，但这一新概念已经进入落实阶段，

亦如整个再平衡战略。

除了发展与实施新的作战概念，对美军海外部署的调整也是再平衡战略的组成部分。其中之一就是美国海军陆战部队在澳大利亚北部的轮值驻守，由美澳双边协议所确定，在2011年11月奥巴马总统访澳期间公布。这一象征性的联合行动意味着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再承诺以及来自地区盟友的支持。另一具有象征意义的动作是在新加坡部署濒海战斗舰，作为美国有志于维护南中国海稳定与安全的证明，中国与其他沿海国家在该海域有领土争端。同时也可被视为新加坡发出的信号——希望美国海军增加在南海的军事存在以制衡中国日益增大的影响力。

再平衡“并不仅仅关乎我们的军事存在”——这是美国政府一贯并反复传递出的信息。经济再平衡的核心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自由贸易协定。奥巴马称之为“我们最具雄心的贸易协定以及适用于整个地区的潜在模式”。按多尼隆的话说，这也被认为是“迈向亚太经合组织（APEC）所勾画的亚太自由贸易区的重要一步”。谈判已经启动，并计划在2013年底前完成。

二、亚太国家的反应

地区性国家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反应是复杂的，虽然大部分国家对美国增加在亚太的存在和承诺表示欢迎，但怀疑与忧虑也同样存在。

2012年10月，坐落于夏威夷、隶属美国国防部的学术研究机构、为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提供智力支持的亚太安全研究中心（Asia-Pacific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举办了一场有关以区域视角评议再平衡战略的讨论会。25位参会者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14个国家，笔者是其中之一。大多数参会者认为美国再平衡战略具有积极意义并表示欢迎。原因之一在于他们希望对中国不断扩大的影响力能够形成适当的制衡，这样就不至于被迫生活在中国或美国的霸权下。另一个原因是，与会者认为前任布什政府没有对亚太地区给与足够的关注，使得美国在影响力竞争中负于中国。

很多关切与疑虑也同样存在。人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再平衡战略是否针对中国。虽然大多数亚太国家希望美国成为制衡中国的力量，但是没人愿意看到中美因这一战略而加剧紧张关系。在此意义上，再平衡战略引发忧虑的原因在于：其所代表的美国政策急转可能引起中国的消极反应。一位参会者说，“在中美之间二选一是我们最不愿看到的结果”，这也是所有参会人的共识。美国再平衡战略再次凸显了地区国家对大国间权力平衡变化的敏感性。

美国政府强调再平衡战略并非针对中国，但是其大部分细节内容由军事战略和作战概念组成却是不争的事实。并且，美国也将中国列为具有军事能力来削弱（即使并非完全抵消）其力量投射能力有效性的国家之一。就经济再平衡的核心部分——TPP而言，美国宣称打算把它建成一个他国可以加入的开放平台，但是

中国看起来没有任何兴趣加入。故而，TPP 的确有可能被视为与其他手段一同用于围堵中国的经济工具，尤其是站在中国的立场上看。

此外，地区国家也存在其他两方面的疑问或怀疑：第一，战略可行性。美国真的能够将其焦点从中东转向亚太地区吗？虽然美国很快将从阿富汗完全撤军，但是局势并没有被彻底控制。且不说伊朗的核计划处于正在进行时，包括叙利亚在内的一些中东国家局势也非常不稳定，并且动荡和武装集团正在向非洲扩散。如果美国在“9·11”后实施干预行动的最终目的是防止再度发生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恐怖袭击，那么立即、完全从中东“转向”就不是一个可行的选项。现实可能是美国被迫重返“两场主要战争”的十年期战略，辅之以一定程度的“再平衡”。

另一重疑虑自然是财政预算的限制。奥巴马在其2011年11月于澳大利亚的演讲中强调美国国防开支的削减不会以牺牲亚太为代价。就在2013年4月，国防部副部长艾什顿·卡特（Ashton Carter）在接受《朝日新闻》采访时，对美国政府的自动预算缩减对再平衡的影响问题回应道，“缩减预算对美国政府的运行确实有负面影响，但不会从根本上影响到实施与再平衡战略有关的行动、投资和部署等等”。然而，近期一些事件也同样引起了质疑。2013年3月，驻日美国空军宣布，位于东京西郊的横田空军基地的年度友谊庆典因国防预算削减而被无限期推迟。出于相同原因，美国国防部官员出访亚太地区的行程安排被取消或者压缩的情况也多次出现。虽然迄今为止，预算缩减造成的负面后果的程度和范围有限，但足以使很多人担心美国政府能否真正履行总统的保证——削减国防开支不会影响到亚太再平衡。全世界正在拭目以待，而国防预算并不在白宫的单独掌控之下。

三、对地区战略环境的影响

像日本、澳大利亚等美国的伙伴和盟友获得了美国对亚太地区承诺的再保证。这是再平衡战略首要而且最明显的效果。但是，这些国家也表达了担忧。其中之一便是，美国的力量投射与1996年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那时美国可以派驻航母战斗群进入台湾海峡，而现在由于中国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的增长，可能无法实施相同的力量投射。中国的反舰弹道导弹（ASBMs）射程据称覆盖了第一岛链以西的东海、南海的大部分区域。此外，反舰巡航导弹（ASCMs）和潜艇也将对美国海军的行动构成挑战。

在近期的战略文件《保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力：21世纪国防的首要任务》中，美国表明了其清晰意图——即使在反介入/区域拒止的挑战下，也要维持力量投射能力。这的确让日本等亚太国家安心不少，因为其自身不具备力量投射的军事能力，只能依靠美国。然而，除了这种宣示之外，美国是否有能力实现其意图却是个问题。虽然美国会给出肯定的回答，但并不令人信服，因为美国从未公开解

释其将采取何种反制措施来应对反介入/区域拒止的威胁。如果美国不能采取可信的反制措施，其政治领导力将面临很高的风险，如失去航母或者回避需要派遣航母的决策情形。

在两种可能情形之下，日本将下决心不再依靠美国，而寻求获取自身的力量投射能力。一种可能是美国抛弃了日本，即美国决定不再为了保护日本的利益而投射力量；第二种可能是，即使美国继续保护日本，但日本出于对美国的意图或者能力（或两者兼具）的怀疑，不再信任美国。从理论上讲，如果中国日益增长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损害了美国力量投射能力的可信度，那么第二种情形有可能成为现实。这套推论也适用于美国延伸性威慑（extended deterrence）的可信度，以及日本发展自身核武器的可能性。问题还可延伸到“空海一体战”概念的可行性与可信度上。这是为落实美国再平衡战略的军事层面而提出的新作战概念。

空海一体战的前提是美军能经受起中国解放军反介入/区域拒止的打击，并成功向第一岛链的内侧或西面，甚至中国沿岸投射军力。但是，即便在美国国防系统内部，也存在认为空海一体战缺乏操作可行性的观点，特别是考虑到当前的预算限制和中国核武库的能力。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国防大学的高级研究员哈姆斯（T.X. Hammes）提出了另一军事战略——“离岸控制”（offshore control）。该战略设想在第一岛链周围建立起防御圈，通过实施针对中国军队的反向-反介入/区域拒止（reverse-A2/AD）行动，将之围困在岛链之内。同时也包括对中国主要的战略咽喉地带进行广泛的封锁。这种观点虽然远非主流，一时也不可能取代空海一体战，但反映出以应对中国不断增长的军事能力为目的的美国战略思维的演进。

然而，事实上，如此高强度的军事冲突几乎不可能发生。对于地区国家而言，可能性更大的情形是在东海和南海发生围绕领海争端的低强度冲突。美军的空海一体战概念如何形成威慑，甚至在这样的冲突中如何付诸实践并不明晰。甚至可以认为，美国的军事作战概念与区域安全环境的现实并不匹配。美国的力量投射与中国反介入/区域拒止之间的竞争，其真正的意义已远不止于单纯的军力平衡，而是会对区域领导结构产生直接和重大的影响，换言之，就是关系到美国优势地位的维持。

在冷战时期，美国无论在经济还是安全领域都居区域主导地位。但随着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很多亚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美国对地区经济的影响力相对式微。当前，美国仅有单一的安全支柱来支撑其领导地位，而中国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的发展可能侵蚀这唯一的支柱。诚然，美国自身的军事能力将在一定时期内继续大幅领先于中国，但是亚太国家认为，美国的力量投射能力不可能一如既往的可信、可靠，这种想法将对美国的优势地位或者区域安全保障者的地位构成严重打击。由于美国在亚太已不再享有经济领域的绝对优势，那么对支撑其领导力的安全支柱的潜在打击即便不至于让美国被中国取代，也可能会终结美国的优

势地位。(见下表)

表1 区域性领导结构的变迁

	冷战时期	现在	未来?
主要贸易伙伴	美国	中国	中国
首要安全保障者	美国	美国	中国
领导结构	不受挑战的美国领导	受挑战的美国领导	二元领导/权力共享 中国领导?

虽然中国可能坚信并且对外解释道,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只是阻止美国的可能干涉与保卫国家主权(例如台湾地区)的军事手段,但中国实际上对美国区域优势地位的可持续性构成了威胁,由此挑战了现有的区域领导结构。这使得中国看似在追求区域霸权,即使其并无此意图。

美国再平衡战略的第二个后果是进一步加剧了地区国家的两难困境。中国是大多数亚太国家的最大或主要贸易伙伴,然而这些国家需要依靠美国为它们提供安全保障。当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时,这种二元依附就造成了两难局面。换言之,只有当中美两个大国保持和平、稳定的关系时,这种二元依附才可能持续下去。

美国的再平衡战略并非直接为了解决地区国家的困境,而是为了压制中国,防止其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只有当中国决定屈服于美国的战略时,才可能到达美国所期望的终结状态,但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中国会做出这种反应。相反,尽管美国政府公开否认,但中国仍有很多人坚信美国再平衡战略的意图是为了阻止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强大。北京大学的王缉思教授写道,奥巴马政府战略重心的东移被解读为对中国野心的防范。

大致说来,地区国家对于中美关系的负面发展有两种应对方式:一种是进一步加深对美国的依靠,另一种是寻求替代性的区域秩序,即便无法完全解决二元依附的困境,也可将其减少到最低限度。

日本就是选择前种方式的典型例子。日本政府欢迎美国的再平衡战略,并通过提升对同盟关系的承诺来支持战略的实施。在导弹防御系统、反潜战和网络安全等领域,日本都试图加强与美国的防务合作。两国政府近期同意启动对日美防务合作指针的新一轮修订,这距上一轮修订已超过15年时间,原合作指针已然过时。虽然两国政府都强调它们的官方立场——同盟并非针对中国,指针也不以

任何具体国家为目标,但是再修订的目的仍被广泛解读为日美防务合作重心的转移——由朝鲜半岛的突发事态转向与中国在东海的可能冲突。日本的总体策略是通过强化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提升自身的军事能力和政治影响力,并最终使得中国融入现行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中。澳大利亚和一些东盟国家也采取了相似的方式,虽然没有日本做得那么明显。

另一种方式是寻求替代性的区域秩序或者领导结构。由澳洲国立大学休·怀特教授(Hugh White)提出的“权力共享论”便是最佳例证。他认为,美国应该停止对区域领导地位的争夺,而与中国在内的其他主要国家分享权力。在其新近出版的《中国的选择》一书中,他写道,中美之间的战争无疑具有明显和严重的危险性。由此,他向美国提出三种选择:(1)抵制中国的挑战,维持现状;(2)退出亚洲,任由中国试图建立区域霸权;(3)留在亚洲,但构建一个新平台,允许中国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怀特教授力推第三种选择。他写道,“亚洲的新未来不是美国至上或者中国至上。美国面临的真实选择不是主导亚洲或者退出亚洲,而是把中国当作战略对手还是工作伙伴”。

另一类似但并非完全相同的观点是由澳大利亚前总理和外长陆克文(Kevin Rudd)所提倡的“太平洋和平”(Pax Pacifica)。他提出这一区域权力结构来反对“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与“中国治下的和平”(Pax Sinica),他认为这两种情形,无论哪种真正实现都不能带来可持续的区域权力结构。以上观点是对维持美国单边领导的替代性选择,这些看法应被视为地区国家对美国当前区域战略缺失的回应。

再平衡战略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后果:进一步恶化了中美之间的战略互疑。2012年3月,由北京大学王缉思教授和布鲁金斯学会李侃如教授(Kenneth Lieberthal)共同完成的研究中,最早阐明“中美战略互疑”的观点。他们认为,中美两国可以在日常性的双边议题上顺利合作,可一旦涉及长期战略意图,双方对彼此都不信任。随着双方国家实力差距的不断缩小,疑虑逐步加深。

2012年10月,王缉思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解释道,“美国的一系列行动让中国担忧。例如,在澳大利亚建立美国海军陆战队训练中心,与日本强化安全关系,甚至试图将东亚的战略安排多边化。”他补充道,自己并不认为美国的所有行动都是直接针对中国,但很多中国评论家相信华盛顿正企图离间中国和这些国家的关系。在解释战略疑虑理论如何应用于再平衡战略时,王缉思指出,“真相就是再平衡观念的一部分是基于对中国可能在亚太地区挑战美国的恐惧。”

四、中美的战略“化学反应”

作为对美国再平衡战略的回应,2012年10月,王缉思发表了《西进:中国地缘战略的再平衡》一文。他指出,“西进”对于中国深化大国间合作、国际环

境的提升以及中国竞争能力的加强都具有战略必要性。他进一步解释道,“中美两国在东亚的竞争,已日益呈现某种‘零和格局’。但若‘西进’,中美在投资、能源、反恐、防扩散、维护地区稳定等领域的合作潜力都较大,而且几乎不存在军事对抗的风险。”这一建议是提升中国竞争力的方法,与此同时,在避免两国在东亚发生冲突的同时,也能扩展与美国合作的机会。可以认为这是再平衡战略新后果的一个先兆——中国的战略多样化(strategic diversification)。然后,中国战略思维中的这种新趋势将如何发展,判断起来还为时过早。

在美国启动再平衡战略时,中国也提出了自己外交战略的新概念——新型大国关系。在2012年2月,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访问美国时首先提出了这一概念。他提议,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和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之间,尽管存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但能基于相互尊重和互惠建立起新型的合作关系。2012年7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发表文章进一步阐释这一概念的细节,并呼吁美国的共同努力。根据这篇文章,“新型大国关系”的主要概念由以下三个支柱组成:

1. 合作而非对立;
2. 双赢而非“零和”;
3. 良性竞争而非恶意对抗。

同时也提出了为实现这些目标而需要解决的五个“棘手问题”:

1. 战略互信缺失;
2. 核心利益瓶颈;
3. 真正践行平等相待;
4. 贸易结构重组;
5. 在亚太地区真正实现良性互动。

这些原则和问题可被视为中国对美国再平衡战略的批评。

美国没有对中国的新提议做出具体回应。关键问题是美国的再平衡战略与中

关键问题是美国的再平衡战略与中国的“新型大国关系”概念是否相互兼容。

国的“新型大国关系”概念是否相互兼容。美国国防部副部长马克·利珀特(Mark Lippert)在近期的访谈中告诉笔者:“我们正在评估,也在试图获得有关这一概念的更多细节”,说明要下结论还为时尚早。

中国的新提议仅仅关注如何处理与美国关系,正如美国的再平衡战略一样,没有解决地区国家二元依附的困境。这两个大国之间会产生怎样的战略“化学反应”还有待观察,但毫无疑问,其结果将对整个地区战略环境造成重大影响。仅就对中日关系的可能影响而言,中日关系当前被认为是本地区内最动荡不定的一对双边关系,如果再平衡战略使得日美同盟加强,而中国与日本进一步疏离,那么未来亚太将出现日美与中国之间紧张对抗的局面。(见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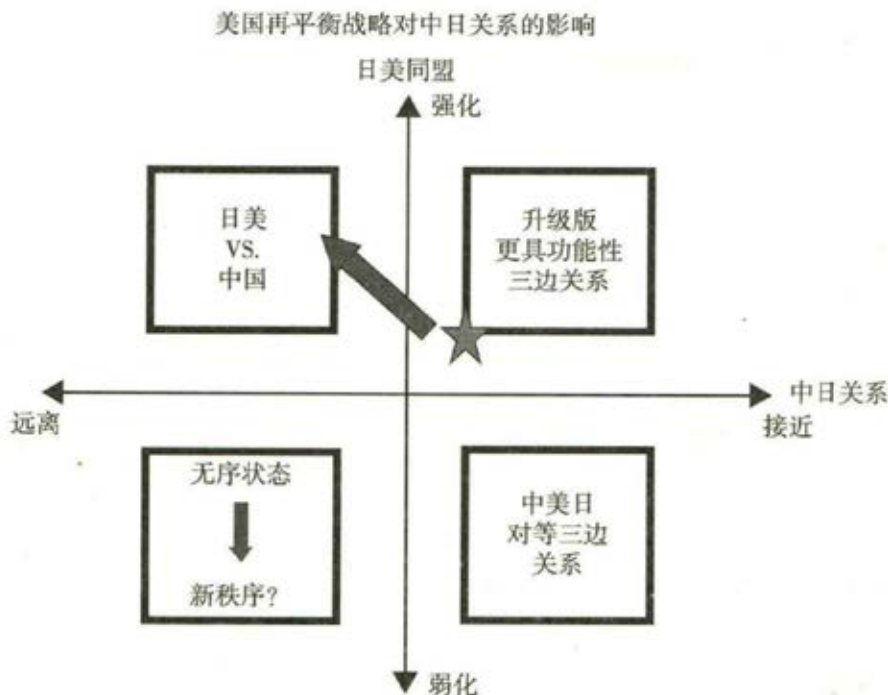


图1 美国再平衡战略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很明显，如果不能协调妥当的话，中美新战略的实施可能造成地区的动荡。中美都必须为保证彼此战略的兼容性而付出认真的努力。这种调整可能需要双方都做出一些妥协，并且可能出现挫折。但从地区国家的角度来说，这便是大国的责任，并且中美都别无选择，只能在这条路上前进。

地区性国家二元依附的困境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除。困境的解决，要么就是美国重新成为大多数地区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要么就是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区域安全的首要保障者。无论哪种改变在可见的未来都不太可能发生，换言之，无论“美国治下的和平”还是“中国治下的和平”都不可能。

如果这就是整个亚太地区将要共同面对的未来的话，那么维持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唯一可能、可行的前景是：中美在当前的分工结构下，共同探寻出和平共处的路径。真正的大国与一般强国的区别是，对其他国家的利益作出承诺，而不是单纯追求自身的国家利益。这正是中美两国现在所欠缺的重要品质，它们需要赢得其他地区国家的尊重和仰慕。

双边合作面临的最严重障碍是战略疑虑。但是，让亚太地区对中美关系最担心的不仅是这种互疑，而是双方都对克服疑虑不再抱有希望的事实（至少就当前而言是如此）。没有迹象显示任何一方在着手处理这个问题。或许，中美对再平衡战略和“新型大国关系”进行协调，并向亚太地区证明两个战略如何得以兼容，将成为一个不错的开端。

（赵寒玉 译；归泳涛 校）